



客厅即工厂

质性研究个案阅读丛书

熊秉纯 著
蔡一平 张玉萍 柳子剑 译

在此，您将有机会读懂卫星工厂女工们的工作和生
活。她们不但要做工，而且还要顾及家
务，很多时候要在自家的庭院或客厅完成
从老板那里领来的活计，所以，这本书才被
命名为『客厅即工厂』。



重庆大学出版社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ISBN 978-7-5624-4886-0



9 787562 448860 >

定价: 25.00元

责任编辑: 夏 宇

封面设计:  周娟 林京羽

客厅即工厂

熊秉纯 著

蔡一平 张玉萍 柳子剑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122

Copyright © 1996 by Ping-Chun Hsiu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9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客厅即工厂,作者:熊秉纯。原书英文版由 Temple university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Temple university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Temple university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09)第1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厅即工厂/(加)熊秉纯著;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0

(万卷方法·质性研究个案阅读丛书)

书名原文: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ISBN 978-7-5624-4886-0

I. 客… II. ①熊…②蔡…③张…④柳… III. 女性—经济—研究—台湾省 IV. F1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3659 号

客厅即工厂

熊秉纯 著

蔡一平 张玉萍 柳子剑 译

责任编辑:夏宇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6.75 字数:180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4886-0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简介

熊秉纯博士 (Dr. Ping-Chun Hsiung) 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多年来从事与社会性别及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与教学。从 1990 年代初开始与国内学者合作,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社会性别的学科建设,以及质性研究方法推广的相关工作。近年来,她致力于对知识传播、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机制的研究工作。

背 景

就学术背景来说,我是做文史研究的,本来与质性研究无缘,到目前为止,也是一知半解。世间总有巧合的事,因我偶然进入妇女与性别研究,认识了熊秉纯博士,听她讲质性研究,那是1997年和1998年,我两次参与了陕西师范大学强海燕教授主持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中加合作项目——“妇女与少数民族民族在高校的成长与发展”,先后聆听了熊老师关于质性研究的讲座,对我算是质性研究理念方法的启蒙吧,或曰开启我进行妇女与性别研究方法上的一扇亮窗。适逢她的博士论文《客厅即工厂》在美国出版了,国内同行特别是郑新蓉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质性研究范例,应在大陆尽快翻译出版,于是我就开始组织人员翻译,但因多种原因搁置,未能付梓。1999年以后,我们在“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中有了更多的合作,2002年,熊老师承担了为课题培训师资的重任,在多伦多大学主办“女性主义教学法与课程发展暑期研讨班”,并亲自构思设计指导制作出版了《女性主义教学法》光盘;年底,她又专程到广州出席了“女性主义教学法与课程发展研讨会”。其后,她一直在关注和推动中国内地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的发展。去年暑期,熊老师应邀再度来中国内地就质性研究方法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举办讲座,期间,以推出方法论著作闻名的重庆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客厅即工厂》中文版。在该书即将在中国内地面世之际,作者请我写上几句,于是只好将自己的粗浅体会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秉纯博士祖籍河南,出生于宜兰,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父亲原在河南当过乡村学校的老师,卜居台湾选择地形环境颇似故乡的台中某地,以寄托乡思。母亲年轻时,辞去教职,把精力时间花在教养子女身上,所生养5名儿女皆获国际名校博士学位,个个学业有成,被华人世界视为母范;儿女成人后,母亲重回小学,是一位让孩子同事爱戴的模范老师。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她在弥留之际,嘱咐家人把住所捐献作为公益教育场所之用。正是有这样的家庭熏染,秉纯选择那些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已婚妇女作为主要对象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她对“方法”(研究和教学)的执著探求,情有独钟,除了受家庭影响,可能还与她深爱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有关;“方法”在古代有“道”、“方”、“途”等称谓,她最推崇老子的《道德经》,她的淡泊睿智,当受益于此;她的孜孜不倦传道授业,也颇有孔孟社会担当之入世精神。诚然,只授业解惑,不以其道其方引领学习者登堂入室,不能使人举一隅而反其三,就不是一位好老师。至少,这些年来,我从她那里学到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法至今受用不尽。

质性研究在中国

在熊老师首次在西安介绍“质性研究”的前一年,“qualitative analysis”就传到中国,引介者陈向明教授译为“定性研究”,以相对于社会学主流方法的“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analysis)”;转年又译为“质的研究”,可能是考虑到这种译法会造成误导——这也是严谨自省的学者的可敬之处;她的名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就是以“质的研究”命名的。

“质的研究”与“定性研究”在中国语境有什么区别?按说,“定性”与“定量”构成对举关系,然而实际上“定性研究”在中国学术语境中是一种虚幻不实的东西,因为它什么问题也没

有解决。诚如熊老师所指出的:它是一种“以思辨性的论述玄想、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综述结论来从事学术论著的习惯”(熊秉纯,2001)。自然,这是一种坏习惯,是学风上的新八股,在妇女与性别研究中见得太多了,归纳起来就是“三段式”——先设定问题(也可能是伪问题);接着自造一些词汇概念描述表现一二三,再分析原因一二三,不必实地调查,凭空立论,振振有词;最后得出结论或提出对策建议——自诩为“定性研究”,实际上是随意给事物贴标签,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更何谈有益于社会。

为什么又叫“质性研究”?质与量相对。“量的研究”也叫“量化研究”,本人揣测盖取其研究是一个过程的意思。不过,“定量”这个词看来也有问题,如谁在控制量的“定”数,包括样本数量和变量的多少,以及其后的数据分析处理,都是人为的,受研究者的先置预设左右的,所以不能说是纯客观、价值无涉的。同样,依愚见,是否“质”也总表现为一种可度量标准才叫“质性研究”?也未曾考证。熊老师超越学究气,把质性研究说得通俗易懂,她说:“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1)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2)它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3)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熊秉纯,2001)它涉及知识的内涵(什么是知识)、知识建构的过程(知识怎样生产)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知识生产的主体如何影响到知识生产结果和效果)。这些在下面还将继续申述。

由此看来,质性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悖而行,它与量化研究是研究的两种路径取向,不可以孰优孰劣作判定。但目前,显然量化研究更多被使用,被崇信,认为量化方法具有客观、精确、普遍和代表性等优点,而质性研究不具备上述优点而受到冷落。最近几年,一些年轻学者与研究生开始有更多的人运用质性研究,但在社会科学研究界仍处于边缘位置。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质性研究是开启未知的亮窗

了解什么是质性研究和它的特点,开始用质性研究开展研究,接下来的问题是:掌握了质性研究方法就万事大吉?对社会问题就能够明察秋毫?非然。因为方法毕竟是工具,正如熊老师所说,“工具没有必然的批判本质。也就是说,质性研究可以写出从纯方法的角度看来很精致的作品;但是,如果没有批判的学术立场和视角,质性研究的实践者依旧可能对于性别歧视、阶级剥削以及其他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客厅即工厂·作者前言》,以下简称为《作者前言》)。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关键是在知识论、方法论与研究主体身份发生了断裂,有好的方法工具但受到主体的立场、价值观、视野与角度的局限所致。比如,尽管阶级与性别这两个社会学中常用的抽象概念,缺失社会性别视角和敏感的研究者,为什么常常对日常的社会性别运作视而不见了?或者只是触及皮毛、浮光掠影了呢?而在《客厅即工厂》一书中,作者却能够选择远离大工厂流水线上与未婚女性不同的工作在客厅中的已婚家庭主妇,还有那些卫星工厂的老板娘,男女雇用者……作为观察研究对象,把他们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还有与之相关的工厂体制、家庭结构、生产模式、劳工控制机制以及人际关系之间交错互动关系一一揭示再现,透过对老板与工人斗嘴、男女工人、女工之间角力的分析,“抽丝剥茧地探讨微观世界中阶级、社会性别与家庭以及生产劳动的关系”(《作者前言》)。作者与她的研究伙伴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观察、感受、体悟她们的工作的艰辛,人际关系中阶级和性别不平等,个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性高尚与弱点……都呼之欲出。一个“采取批判的视角,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案例得到揭示和展现(《作者前言》)。这里批判的视角就是社会

性别视角,使作者有别于以往讨论台湾“经济奇迹”的偏爱加工区的大工厂、当局的经济政策、男性工人与老板,而忽略了工作在客厅中的已婚家庭主妇和卫星工厂老板娘的作用。忽略了后者,将导致什么结果?不但抽空了阶级与性别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如老板娘身份对女工而言她代表资方利益扮演监督剥削工人的角色,享受特权待遇;对丈夫而言她是不拿工资的无偿劳动者,就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来说,连女工也不如;她向丈夫诉苦,丈夫还以“没有免费的午餐”刺激她,表示他是她的“恩主”养活了她。而女工中如凤媛,多次申明她的工作不是为挣零花钱,而是还要养家,她的丈夫不具有养家的能力和能力而待业在家);也扭曲了台湾经济奇迹的真相,抹煞了支持经济奇迹的数不清的散布在田间农舍、巷弄街坊的“客厅工厂”中已婚家庭主妇的贡献;同时也放过甚至美化当局经济发展政策与社区发展方案的弊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别视角给质性研究赋予生命和灵魂,它通过一个个的个案收集分析,虽不能得出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微观的个案研究更多时候能清楚呈现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和复杂的权力关系,因而能够把握变革之肯綮命脉和变革之方法途径。

质性研究应该成为认识社会推动变革的利器

可见,质性研究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方法技术的掌握是否娴熟,而在研究者的认识论、立场、态度和反省精神。这里,认识论的核心还是围绕着知识的内涵(什么是知识)、知识建构的过程(知识怎样生产)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知识生产的主体如何影响到知识生产结果和效果)。什么是知识,直接关系到谁有知识,这又关涉到为谁、为什么研究的问题;如果没有变革社会使之更公正平等的诉求热忱,就不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存之不足,不会怀着善意和建设的态度去付诸行动改善;所以质性研究应该成为社会研究者和行动者手中推动社会变革的利器,而不是使之沦为炮制精致的学术论文以晋级升迁的

工具。

好的质性研究不是轻而易举的。《客厅即工厂》一书记录下作者成年累月地到卫星工厂与男女工人、老板及老板娘一起工作、生活、观察、访谈,与他们打成一片,取得信任。作者在《作者前言》中说:“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我变成了一个研究的工具和机器,不仅靠着视觉、听觉收集田野资料,在整个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对宏观的制度、微观的机制以及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与临场当事人的社会互动,都成了我日后梳理、认识、洞悉微观社会机制的素材。”这又使我回忆起十二年前她在西安讲课时的情景,和她说过的精警之语,如:一天的观察需要两倍的时间整理资料,分析材料时如何找“闪光”的中心词,写作时“把着材料走,一刻也不能离开”……当然,她对被建构的“经验”也保持着警惕,在材料提炼、综合、提升到理论的过程中,她用“抽丝剥茧”作比喻,永远刻在我的脑海,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深远,不但对社会研究,就是对我这以文本为主的人文学者来说,也启发良多。在十几年间,我在她的书中,文章中,言谈、电话和邮件中,处处感受到她不断反思的自觉与忧惕之心,从没有自以为是,强加于人,而是虚己体察,避免作为学者与教师的先入之见,做到尊重多样、尊重差异、尊重自己的研究对象。

行文至此,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意象: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践行者与倡导者出于学术探索和社会变革的双重使命,吞食社会生活的“桑叶”后吐出丝,自己做茧又破茧而出,抽丝剥茧,织成锦缎,奉献社会,满足人们所需。

杜芳琴

2009年5月6日于清新园

参考文献

熊秉纯.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2001(5).

《客厅即工厂》的探索,采取批判的视角,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言和第1章先利用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描绘出台湾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并讨论它与全球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检视了相关文献对台湾经济发展,政府发展政策,社会变迁中阶级、性别和家庭所提出的理论和描述。整体说来,本书对台湾经济发展政策及其配套的社区发展方案做出了深刻的检视,对这些政策和方案偏袒资方、维护父权体制的本质提出批判性的讨论。这个批判的、社会性别视角贯穿全书,并从两方面阐明相关文献论述的盲点与不足。

第一,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到台湾作田野调查时,所关注的重点是与西方生产方式相同的以流水线作业为主轴的大型工厂,以及在大型工厂就业的未婚女工。这些设在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大工厂虽然重要,但是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大型工厂企业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动力。那些数不清、没有招牌、散布在田间农户和巷弄街坊的“客厅工厂”才是台湾经济奇迹的生产主力。我开始做田野时,关于台湾家庭式小型工厂的记载只是凤毛麟角。因此,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即主要议题,就是在学术文献上准确呈现台湾经济发展、生产过程及结构的原貌。

第二,本书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呈现和揭示女性劳工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过去的文献或者偏重在加工出口区工作的年轻未婚女工,或者只关注男工由黑手(技工)熬

成头家(小老板)的奋斗经历和心路历程,在这些文献中缺席的是结婚后的女工(家庭主妇),以及老板娘在台湾经济奇迹里扮演的角色。社会性别的视角让我能够把其他学者“视而不见”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来。本书借着对家庭工厂的生产与家庭结构交错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显示美国学者马杰里·沃尔夫所提出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这个概念,它虽然能理解农业社会里台湾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经验,但是当台湾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后,这个概念已不适用。

从第3章到第6章,我主要根据田野参与观察所得的资料对工厂体制、家庭结构、生产模式、劳工控制机制进行了细密的描述,文中通过对老板与工人斗嘴、男女工人脚(角)力的分析,抽丝拨茧地探讨微观世界中阶级、性别、家庭以及生产劳动力的关系,目的是让读者能身临其境般地看到台湾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夜以继日地营造出来的。如今,不仅生产劳动与家庭结构紧密结合所产生的“客厅即工厂”模式已经式微,台湾在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地位也已经改变,而且台湾的家庭结构、经济生产关系、政治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书中文译本出版的意义除了见证台湾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足迹外,作为一个研究个案,本书呈现的是以质性研究的方法,剖析政治体制、社会脉络、家庭结构、经济生产、社会性别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因为当时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学术素养的限制,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空间。从质性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有两点值得提出来讨论:

第一,田野观察的经验和田野笔记的细微描述让我看到并且对于台湾社会以父权为根基的社会制度、文化意识以及父权制度怎样在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同时还一再被复制提出解释。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我变成了一个研究的工具和器皿,不仅靠着视觉、听觉收集田野资料,在整个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还不断地对宏观的制度、微观的机制以及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与临场当事人的社会互动,都成了我日后梳理、认识、洞悉微观社会机制的素材。

第二,当时,虽然有批判的精神、使命感和志向,但是,这不是一个行动研究的个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研究方面的训练,没有系统地学习行动研究的有关方法。而且,台湾女性主义的行动团体当年还在起步阶段,以职业妇女、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妇女运动,对于以工厂女工为主体的研究视为异类。而工人运动的团体所关注的对象仅限于男工,对社会性别议题又有视而不见的先天性盲点。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政治时空里,对一个出国进修后回到台湾作田野调查的研究生而言,能完成一篇有批判性的论文本身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政治诉求。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没有个人的盲点,因为身为外省子弟,从小到大,生活圈子相对单纯,而且那时年轻,天真地认为,一个学者的职责在于完成掷地有声的著作,只要把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社会变革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事隔多年,年事渐长,阅历渐深,不但意识到单一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也看到学者从事、参与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虽然对于社会变革的向往、批判视角的坚持仍然如一,但是已经不再天真浪漫。

这个研究出版之后,十多年来的教学、思考和观察,让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质性研究作为一个探讨研究问题的工具没有必然的批判本质。也就是说,质性研究可以写出从纯方法的角度看来很精致的作品。但是,如果没有批判的学术立场和视角,质性研究的实践者依旧可能对于性别歧视、阶级剥削以及其他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于2001年在《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质性研究方法刍议》一文中,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质性研究对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可能贡献。这些年来,经过各方学者筚路蓝缕的努力,质性研究在中国内地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逐渐受到青睐,对于研究方法规范化的讨论渐多,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已越来越多地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此书中文版发行的契机,我愿与读者共同努力,让质性研究进一步得其所用。

本书能在国内出版,有很多幕后的功臣。书稿第一阶段的翻译是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今更名为性别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杜芳琴教授统筹安排的,承担翻译的有时为天津师范大学教师的张玉萍(致谢、导言、第1章、结论)、时为《中国妇女报》记者的蔡一平(第2、3、6章)和时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的柳子剑(第4、5章)。初稿译成之后,我对全书进行了文字整理,当年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吴丹同学,帮我对全书进行了仔细校对;其后杜芳琴教授再在遣字造句上加以修订润饰。在书稿准备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新蓉教授一直给我很多精神鼓励。本书最终能够跟读者见面,要特别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雷少波编辑,对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努力。

1980年代末期我开始与国内投入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的学者接触,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前后几年,与NGO草根组织的交流特别密切,其后因为参加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交流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的社会性别大学课程发展项目,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有更加密切的合作。二十年来的交流切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姐妹情谊、“革命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在本书出版之际,一并致谢!

致 谢

这本书虽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却是在众多师友亲人的帮助下完成的。首先要感谢我在 UCLA 的老师们在学术上给予我的帮助:Lucie Cheng, Ruth Milkman, Francesca Bray, Karen B Sacks。在书稿审阅过程中,我收到多位审阅者的建设性批评反馈。尽管我没有将所有的意见纳入书中,但是他们的评论与所提的问题对我理清自己的思路很有帮助。Joan Campbell 对本书的编辑和文字的润饰提供了很多帮助。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把教育看作培养我的最关键的要事。尽管当时家庭经济非常拮据,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我们兄妹 5 人求学并完成高等教育。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对女儿与儿子一视同仁;感谢我的母亲,她坚信自己的女儿绝不比任何人的儿子差。这本书也是对我的婆婆何江惠英女士的纪念。与她相处,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在社会强加给她们的重重压制和苦难中,妇女如何在毫无权力的社会底层求生存。

如果没有诸多工厂老板和工人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我十分珍惜在田野里和他们共同工作的经历。我深深感谢那些已婚妇女将她们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向我娓娓道来。她们勇于面对艰辛,在生活中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使我受益匪浅。

Raymond Sirgist, Michael Hui, 以及最近 Cynthia Mclean 给予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和友谊,使我能在困境中学着实践道家无为的思想。我还要特别谢谢我的丈夫何友楠,他的幽默感和闲散的生活态度使我能够追寻自己的梦。

感谢以下出版社允许我引用他们的出版物:表 1.11 至表 1.14 的数据引自 Bier Chou,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 in women's status: A reevaluation of some data from Taiwan," 原文刊登在由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Wei-Yuan Cheng 及 Hou-Sheng Chan 编辑的 *Taiwan: A newly industrialized state* (台北:台湾大学社会学系, 1989)。还有,导言中我田野调查的反思部分,是根据 *Between bosses and workers: The dilemma of a keen observer and a vocal feminist* 所引|申的,该文发表在由 Diane Wolf 主编的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6) 一书。

书中凡是引自中文资料的中文姓名和词语,都是根据韦氏拼音,其他则用罗马拼音。

这项研究得到以下机构资助:UCLA 的泛太平洋研究中心,台湾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台湾)提供了本书的出版经费。